

Opinion

期待柳传志这项提议早获政府回应

◎李允峰

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建议,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手段让利于民,比如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收回大型国企利润的一半,用于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型国有企业2008年整个利润9000多亿,应当用一半作为企业再发展的投入。他表示,对于企业的发展,国家用资源、用钱做了投入,因此这个钱财政收回后可以再用。

柳传志的提议直达社会的痛痒之处,含金量很大。很多人在谈论这个建议的时候都表示赞成。如果再加上削减企业高管年薪,特别是亏损企业高管年薪的话,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才不会变相地流入到少数国有企业高管的腰包,才能真正改善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体系,实现国家藏富于民,国富民强的心愿。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习惯了国有大型企业在交完利税之后把利润的大部分归为己有,这才有了越来越高的企业高管年薪,才有了因为MBO做手脚而锒铛入狱的高管。柳传志的这一建议,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带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高管不合理的高薪问题,以及降低高管的腐败风险。我们理应对和柳传志一起呼吁,大型国企的

利润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是国有,收回大型国企一半利润增加消费,这事关拉动内需,振兴经济,更事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事关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更事关如何解决国有大型企业的所有者缺位带来的制度弊端。这每一项都直击当前经济发展当中的要害问题。

这样事关民生、企业、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造福全国多数人的建议,为什么被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老总代表提出来,那么多经济学家、国有企业家、政府官员真的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许不是想不到,而是想到了不乐意提出来。收回大型国企一半利润增加消费,或者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都牵涉到国有企业创造利润之后的财富再分配问题,更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是一件得罪人的建议。

目前,政府在千方百计拉动内需,在刺激内需的方案上集思广益。笔者认为,柳传志提出的方案,既是一条真正有效拉动内需的好建议,也是一条藏富于民的具有前瞻性的建议。毕竟,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中小企业倾斜。为了尽快让人民富裕起来,培养起庞大的消费能力,带动经济成功转型,中国的发展路子应该尽早调整。

莫让“其他支出”逃离监督法眼

◎刘效仁

我国目前整个科学研究费用占GDP的总量只有1.49%,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在2%以上。就是这有限的费用,真正落实到研究上的又有多少呢?且看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恩迪抖出的数字:“科技部的经费198.1亿,但是其中‘其他支出’是69.5亿,占了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这个‘其他’到底包括哪些部分,这个钱怎么用法,是我非常不明白的地方,这个‘其他’含义不明确。”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投入逐年下降的问题固然需要改善,更应当防止“其他支出”成为权力的后花园,逃离监督的视野。

从国家发改委提供的财政预算也可以看到,所谓“其他支出”不仅秘而不宣,而且占比很大。作为公共财政来说,“其他支出”“秘不示人”,有违公开、透明、完整、统一的原则。一方面,既然是公共财政,作为纳税人委托“看财”“理财”的国家职能部门,当没有部门和团体的私利可言,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将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列入“其他收入”,不告诉自己的主人,不告诉负责审议的人大代表们。另一方面,既然由人大代表审议财政预算,就有权利知道财政收入和支出安排的详细内容,就应该了解财政政策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持续性,自然有权利知晓那部分“其他收入”又是如何安排,如何监督和制约的。

公开、透明、完整、统一、效能和可持续,当是公共财政的生命和灵魂。预算的透明性,是维护公众知情监督权的必然要求。在不涉及国家机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信息的情况下,

国家预算的透明性不仅要将其具体安排数公开,而且由职能部门提供相关的术语解释和背景资料,以保证人大代表和公众能够真正看懂相关信息,履行好审议监督职能。完整性是指预算信息应该告诉所有政府机构的所有相关信息。随着经济行为的复杂化,预算规模逐渐庞大,预算收支项目也日渐多样化。仅预算支出除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之外,还有预算外支出、或有支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投资性支出。如果不公开,不通过人大代表的审议,就有可能使“其他收入”游离于监督之外。

事实上,也只有公开、完整、周详的预算报告,才能确保在人大代表的审议下,形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我国2003年基础研究占R&D的5.49%,2004年降到4.7%。“科技部总经费中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2009年是26亿”,“其他支出”竟然多达69.5亿,何以不拿出更多的经费用于重点基础性研究?这样的安排,在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目前仍然很低的大背景下,不显得十分滑稽么?

更应看到,“其他支出”一旦逃离监督制约,就有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后花园。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个统计显示,目前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和部门。这些年,屡为公众舆论所诟病的“驻京办”以及盛行的“跑步钱进”,不正是因为职能部门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和机动空间么?正因如此,我们才有理由对“其他支出”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质疑,也只有通过公开审议和有效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其他支出”藏污纳垢。

服务业: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新引擎

◎郑景昕

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了《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3%;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8.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1%。

综合最近几年我国GDP的产业构成,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就一直滞留在40%左右。而按照国际经济发展经验,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时,一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将从45%左右提升到60%以上。

从以上这些数据,除了看到我国发展服务业具备很大的潜力之外,我们还需明白,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第二产业(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来自服务业的有效支持。如果服务业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状态,那么它势必成为中国长期持续增长的“瓶颈”。

服务业(如律师、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服务等)的发展,是成熟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各产业之间的协调角度来看,服务业的主要功能是完全市场信息,强化市场信用从而大大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

生产型企业将其主要精力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开发上。那些与企业经营发展密切相关但不属于企业核心竞争力范围的活动(如投融资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物流、法律服务等),在服务业发达的市场里,企业就可以“外包”给中介机构来完成。否则,企业会因为将精力过于分散在那些自己并没有比较优势的活动中而丧失竞争力。众所周知,一国经济是否强盛最终还是要看该国的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

即使没有碰上当下这场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已面临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在危机背景下,发展服务业,有意识地促进产业升级依旧不可废弃。现在大力发展服务业正当其时,服务业或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到高速增长道路上的“新引擎”。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服务业不够发达,因为需要大学生的主要服务业。

所以,由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发展服务业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我国的产业实现升级。比如,有必要放开某些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等。必要时,政府也可以适当地在税收政策上对某些重要的服务行业予以优惠。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Observer 上证观察家

在政府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业已公布的投资去向中,拿到项目的绝大部分是大型国企。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衰退浪潮中率先上岸,绝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草根性责任担当。各级政府 and 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振兴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集各方之力共度时艰。

复苏经济岂能缺了民营资本这条腿



章玉贵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令人激动与感动的地方。对于那些正饱受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煎熬的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听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要鼓励民营资本在基础设施、金融和公用事业领域投资,并在信贷方面对中小民营企业予以支持时,想必宽慰很多,民营企业活得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遭遇的困难,就是占GDP总量66%的民营经济的困难。这些长期在夹缝中生存的主要就业载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在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冲击,比拥有最多社会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更直接、更严重。因此,在外围经济短期难以企稳、内需有待更有效拉动的艰难时刻,来自民营企业的“两会”代表期待政府的承诺能够化为切实行动的热望,一点也不为过。

只是我们注意到,尽管最高决策层已经深切认识到民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尽管首席经济大省广东也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宝押在民营资本身上,但真实经济现状却告诉我们,民营资本在本轮扩大内需的一系列计划中仍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根据业已公布的投资去向,在政府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4000亿,农村民生工程3700亿,基础设施投资15000亿,社会事业1500亿,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2100亿,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3700亿,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10000亿。但据报道,拿到这些项目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政府投资的资金基本上就在国企内部循环。例如,仅仅是国家电网一家就拿到近万亿的财政资金,这家超大型国企即使连电网开关这样的小零部件,也未必分给系统外的民营企业,只有那些与其有着直接利益关联的民营企业才有可能分到一杯羹。

另一方面,在今年1月份1.62万亿元的信贷投放中,90%以上的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中标的工程项目。尽管监管部门一再鼓励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尽管江浙等地已开始启动

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措施,但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依然是“货币宽松,信贷紧张”,贷款空间受到明显挤压。即使是贷到款的中小企业,银行往往还根据项目进度发放资金,条件十分苛刻。由于资金链断裂,加上订单大幅缩减、贸易风险增大、资金回收困难、出口利润趋薄等,一些外向型中小企业无奈歇业。很难想象,在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国企独占投资资源而广大草根性民企得不到切实支持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能够率先复苏。

因此,中国经济要在全球衰退浪潮中率先上岸,既需要大手笔投资与“国家队”进场,也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责任担当。为此,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振兴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集各方之力共度时艰。

不错,在经济处于下行的困难时期,政府一般是不太会采取那些缓不济急的经济措施的。通过大项目的启动来给经济基本面上注入活力,从来都是各国政府的偏好。但是正如笔者在本栏多次分析过的,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天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增长。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长,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双动力。

因此,在热切期待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我们切不可忽视民营资本的关键作用。尤其在关乎民生的就业方面,民营企业的作用更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过去几年,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浙江省,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0%。既然如此,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应该以实质性举措营造经济复苏的内在环境。

首先,应该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

振兴的准入门槛,支持有条件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让有实力有报国责任的民营企业能和国有资本平等参与汽车、钢铁、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如果先期的4万亿投资蛋糕已经切割完毕,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肯把已经落袋的投资项目拿出来与民营资本分享,那么后期有可能出台的更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一定要降低准入门槛,并以透明化可监督的操作吸收民营资本的进入,以激发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

其次,必须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把大多数中小民营资本当作好的市场

建立三个层次住房体系初步设想



吴志峰

目前房地产市场可以称之为政策混乱之地、舆论沸腾之所,人们以此作为平台展开辩论甚至对骂,地产开发商从整体上成为民众的对立面,这在各行各业中是绝无仅有的。高房价挤垮了居民购买力,抑制了消费需求妨碍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如果不推出政策调控高房价不行;但抑制房地产市场在这个“时间窗口”使成交量低迷,既影响了政府自身的收入来源,又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政府“管”还是“不管”,确实是个问题!

现在正是廓清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时刻!值此“两会”召开之际,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应考虑建立三层次住房体系,即形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三个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明确每一户城市居民有权利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中央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大力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对不占用政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资源的居民进行税收返还以鼓励其购买商品房。三层次住房体系的要点是:

第一,以经济适用房建设为核心。各地政府有建设经济适用房的义务,明确每一户居民有权利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废止抽签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制度,废止将经济适用房用于向公务员、教师 and 优抚人员分配的政策,如此既可避免经济适用房分配过程中的寻租腐败,又能稳定居民住房预期,增强人民幸福感。

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运营遵循微利模式,同样缴纳土地出让金但限定价格,设计建造实行面向开发商的招标制度,小区管理实行面向物业公司招标制度,销售价格由政府限价。如此,经济适用房对政府不会造成财务负担。对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开放了业务机会。

经济适用房要名副其实,面积、户型严格限定,“参数”可由当地人大投票确定,对选址要有科学布局规划,形成有利于居民生活的社区结构,防止经济适用房郊区边缘化的倾向。

另外,需要明确,经济适用房只能用于自身居住,如果出售只能卖给政府,以法律禁止经济适用房的市场方式出售,明确每户居民既有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也有将经济适用房出售退还政府的义务,以形成经济适用房的良性周转。居民如果要改善居住条件,政府通过退税鼓励其购买商品房。

第二,在经济适用房之下辅由政府廉租房,形成对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的住房救助制度。

主体来对待。笔者并不否认某些民营中小企业确实市场信誉不佳,在缺乏坏账准备金和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为避免承担风险而对民营中小企业惜贷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但笔者更相信,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非常珍视自己的市场信誉的。只要政府完善担保制度,允许银行增加坏账准备金,并积极创造条件让民间金融发挥建设性作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两会观察

建立三个层次住房体系初步设想

各地政府有建设廉租房的责任,每年用于廉租房建设资金列入预算。廉租房建设资金可从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土地转让收入中提取,中央政府对在有困难的地方政府支持廉租房建设,予以奖励。明确每一户租住居民必须自住,不能转租,不住时强制退回,租金根据当地生活水平确定并定期调整。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农民工纳入廉租房体系,以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第三,在经济适用房之上实行商品房市场。

由于有经济适用房托底,商品房的市场发展趋势一定是面积较大、环境优美、服务优良,高端市场甚至是奢侈的,以满足人民追求优质生活的需求。因此即使实施了“三层次住房体系”之后,商品房市场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商品房从政府有偿取得土地后,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设计建设,市场定价,政府不再限制商品房面积、户型,而是由开发商根据细分市场和自身战略确定;政府也不必区分什么一套二套房贷款,而是由银行根据风险制定利率,政府在商品房市场应取消行政干预。

鉴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中国仍不宜鼓励商品房作为投资品,因此有必要征收物业税,对二套以上的商品房市场征收累进制物业税,以此控制商品房市场的投资泡沫。

对于为提升生活质量愿意还贷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居民,应明确实行税收返还鼓励制度。因为既然明确每一户居民有权利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当他不占用政府这个资源时,政府就应该予以补偿。补偿方法可以实行所得税退税等多种方式。同样地,对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开放了业务机会。

经济适用房要名副其实,面积、户型严格限定,“参数”可由当地人大投票确定,对选址要有科学布局规划,形成有利于居民生活的社区结构,防止经济适用房郊区边缘化的倾向。

另外,需要明确,经济适用房只能用于自身居住,如果出售只能卖给政府,以法律禁止经济适用房的市场方式出售,明确每户居民既有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也有将经济适用房出售退还政府的义务,以形成经济适用房的良性周转。居民如果要改善居住条件,政府通过退税鼓励其购买商品房。

第二,在经济适用房之下辅由政府廉租房,形成对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的住房救助制度。

Column 专栏

美国经济真的“一无是处”吗?政策救助真的“多多益善”吗?美元贬值真将“不期而至”吗?有些观点似乎容易麻痹思维。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对这些看起来很有诱惑力的观点,多一点深入思考很有必要,毕竟转换一下视角,那些观点便能衍生出太多意义深远的其他战略选择。

环境越是动荡,越要保持冷静

——对几个主流观点的再思考



程实

培根有言:“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他必然以疑问而告终;但是,如果甘愿从疑问开始,他将肯定而告终”。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对主流观点多疑,多思,多虑,似乎并无裨益。比如,政策救助真的“多多益善”吗,多元化真是“势在必行”吗,全球化真将“戛然而止”吗?

虽然没有马思聪以“怀疑一切”为箴言的底气,但像笛卡尔一样以“怀疑为方法”,也许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这些主流观点的认知。

第一点,美国经济真的“一无是处”吗?看过去,作为次贷危机的发源地和震中,美国经济全方位步入泥沼,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已被调降至-6.2%,创27年新低,主引擎消费萎缩4.3%,造成了3.0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损失,今年1月失业率已升至7.6%,创16年新高,不出意外的话,4月底世人将看到-7%左右的首季增长率,那时候美国经济危机的本次浩劫将从核心维度上真正超越大萧条以来的全部12次衰退,而且届时17个月的持续期正好盖过大萧条后最高纪录的16个月。

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经济会不会比其他经济体更糟糕?且不说同样的2008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的-1.2%有统计以来最低,日本的-1.2%也是35年来最差,就从深层次结构角度看,危机中的美国经济还有诸多被习惯性忽视的亮点,其一,美国经济具有周期独立性。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美的地方了,经济复苏的“美国梦”同样只存在于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可以仅仅依靠自己,当然,也只能依靠自己走出衰退、创造复苏,而在美国真正复苏之前,欧洲和日本都很难真正拥有改变衰命运的机会,因为从经济推动要素的对比看,只有美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是最低的。

其二,美国经济具有结构要素弹性,这为结构调整奠定了更为有利的基础。相比欧日,美国宏观层次的政策调整和微观层次的行为方式转变更加迅速。例如,欧洲央行的政策弹性就远不如美联储,特里谢去年7月曾自以为是地加息,如今在缓慢降息的同时还对通胀风险念念不忘,而伯南克无论是在降息力度和工具创新上都行动迅速,就个体而言,美国人消费模式的快速转变也令人吃惊,今年1月5%的个人储蓄率较前一个月份骤然提升了1.1

个百分点,幅度明显高于欧日,虽然这种调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阵痛,但也会引发更快的结构要素再平衡。另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相比欧日具有更大弹性,在危机引致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中,美国更容易实现产业转移和更替。日本1月失业率较前一个月反而有所下降,这倒不是因为失业率在上升,而是混账的日本失业者正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放弃继续寻找新工作,这不仅给社会保障增加了负担,还降低了危机中新兴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持。欧洲的高福利和工会强权不仅增加了企业危机中的压力,还限制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所需要的产业收缩与再调整。

其三,美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政策稳定性。确实,奥巴马新政的一系列政策有很多缺陷,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它苛责有余是因为之前对奥巴马期望太高。奥巴马的个人魅力依旧无可匹敌,这为政策稳定性维持和政策有效性针对性增强创造了条件。欧洲的政策不稳定性源自其作为统一货币区独有的结构性尴尬,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当危机给区内经济造成大小不一的冲击之时,其各自为政的救助政策很难实现合力,在相互博弈之中,其整体和个体的救助政策都随时

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日本的政策不稳定性则源自其政局不稳的现状,受“醉酒门”等负面事件的影响,民众政府的信任支持率大幅下降,这不但导致现任政府在心态变化之余可能做出有失理性的政策选择,还加大了未来政局突变导致朝令夕改的可能。

那么,美元贬值真将“不期而至”吗?这个观点本身可能完全正确,但关键问题就是无可挑剔的观点反而容易麻痹思维。未来很长,重要的是不是美元会不会贬值,而是美元在何时才会贬值。从彭博系统提供的预期结构看,大多数市场主体认为2009年内可以看到美元拐点,早一点的认为第二季度,晚一点的认为下半年,美元就会由于1.75万亿的财年赤字和积弱不振的经济数据而重回颓途。但从对美国经济的第一个怀疑出发,美元贬值时点的论调可能需从两方面深入思量:一方面,虽然就连美联储3月5日发布的黄皮书也预期美国经济2010年前难言复苏,但横向比较表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状况可能不会比美国好上很多,特别是不太可能先于美国复苏,基本面的对比给美元提供了部分支撑;另一方面,美元和黄金在危机中的避险作用进一步凸显,且呈现越来越强的排他性,由于2009年危机难以见底,美元在动荡环境中的重要性依旧会给予美元提供一份支撑。因此,对于美元未来贬值这个诱惑性的观点,多一点深入思考是必要的,毕竟这一观点能衍生出太多意义深远的其他战略选择。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